

政治学与国际公共管理丛书

区域国别讲演录

LECTURES ON AREA STUDIES

郭树勇 主编
左品 副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政治学与国际公共管理丛书

区域国别讲演录

LECTURES ON AREA STUDIES

上海人民出版社

郭树勇 主编
左品 副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区域国别讲演录/郭树勇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政治学与国际公共管理丛书)

ISBN 978-7-208-13865-0

I. ①区… II. ①郭… III. ①国际关系-文集 IV.
①D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8051 号

责任编辑 史美林

封面装帧 王小阳

区域国别讲演录

郭树勇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5.25 插页 4 字数 211,000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865-0/D·2884

定价 48.00 元

丛书总序

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中国的政治发展重点和外交取向发生了新的重大的变化。一方面，我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道路，在继续推进党内民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明确提出了推进人大制度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更加重视发挥民主协商作用的命题，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更好的政治保障。另一方面，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思路更开阔、方式更新、力度更大，中国梦与世界各国的梦相通，“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深度联结，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和亚信会议等新兴国际组织将更多更好的中国声音、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带给国际社会。由此，中国进入了推进改革开放、实现民族复兴、管理国际公共事务、维护与缔造世界和平的新时期。这些变化，正在形塑着中国和世界的面貌和秩序，其影响的深度和速度有时甚至超出了决策界和研究界的预料。

变化的实践需要变化的理论。变化的理论要解释变化了的、正在变化的和即将变化的政治实践，这种实践已经不单是一国的实践，而是具有一定的世界意义。这显然是一个宏大的世界性课题。研究之难，可以想象。它既要继续借鉴又要实质性地突破西方的话语体系，并对国际社会的结构与进程力争作出细致入微的考察；既要认真总结中国政治与行政实践经验，又要对实践起到指

导或参考作用；既要坚持问题导向、面向未来，又必须对历史和现实的基本问题作出必要的说明，从而使得学术研究尽可能接近历史、逻辑和现实的统一。开展上述研究，需要中国与外国、中央与地方、政界与学界等各类专家的共同努力，需要政治学、国际关系和行政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

上海外国语大学有志于这方面的探索。承蒙教育部和上海市的支持和学界的厚爱，上外自20世纪80年代初在加强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的同时，开展了国际问题研究和政治学研究。1987年在上外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对上外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上外的政治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除了国际政治本科专业、国际关系等6个专业硕士点之外，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先后建立起来，中东研究所、《国际观察》杂志等机构获得了全国性声誉，欧盟研究中心、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中外文化软实力创新基地等一批教育部和上海市研究基地影响日隆。2014年，学校决定成立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进一步整合政治学研究力量，全面贯通政治学本科、硕士、博士与博士后的人才培养，并确立了在重点发展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的基础上加快区域国别与比较政治研究、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外文化软实力与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思路，通过发展公共管理支持政治学发展，把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区域国别人才培养等提上了政治学学科建设的新的议事日程。

这套政治学与国际公共管理丛书的宗旨，就是在此背景下为校内学者和校外协同创新专家提供展示上述探索成果的舞台。丛书将重点围绕比较议会、国际公共行政、国际组织（含联合国事务）、区域国别理论、中国学理论等领域，力图突出三个特点：一是紧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和参与或主导国际公共管理的新发展、新趋势这个主题，以新的视角透视中国内政外交的新常态；二是更加

注重总结中国政治的成功经验及其中国学意义,包括中央与地方在推进党内民主、创新人大制度、推进民主协商等方面的经验;三是鼓励研究中国参与或主导的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特别是新兴国际组织的发生发展及生态、文化、卫生、人力资源等相关的国际公共管理问题。为了做好丛书组织编辑工作,我们邀请了有丰富政府工作包括外交工作经验的专家进入编委会,为我们提供指导。我们希望,丛书能够为国际组织和区域国别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对从事外交和国际组织工作的同志提供参考,并为更好地在国际比较视野下开展政治学研究和公共管理研究积累经验教训。囿于时间与能力所限,难免在探索中考虑不周、出现差错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主 编

2015年6月

序 言^{*}

加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全球治理大业

近年来,“一带一路”构想,开放发展理念,企业走出去、文化走出去等重大命题的提出,加快了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步伐,推进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统筹,为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开辟了新的国际视野、搭建了新的国际舞台。几千年安土重迁的华夏子孙势必更加密集地踏上全球化的列车,更加广泛地走向异国他乡,了解、适应、融入更加广阔的世界。这一趋势带来的挑战无疑是多方面的,但首先要解决的是,我们多大程度上了解扑面而来的未知世界?这一状况对我国国际人才培养和国际研究提出了紧迫要求。其中,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出来。

区域国别研究,是针对特定国家或者区域的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进行的全面深入研究。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问题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联系密切,但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大于后者。它具有全面性、深入性、及时性和战略性等特征。全面性,主要是指研究对象包罗万象,政治经济无不涉猎;深入性,主要是指抓住区域国别的关键问题和主要矛盾,提纲挈领地把握要害,透过现象看本质;及时性,主要是指从动态中把握对象国或对象区域的发展趋势,了解形势最新进展和主要动向;战略性,主要是指研究者要从国家的现实与长远利益出发,提出关于研究对象形势发展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和有利影响,形成相关咨询建议。

^{*} 本文原载于《人民日报》2016年2月15日14版,题目有改动。

当今时代,区域国别研究意义重大。区域国别研究直接服务于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和全球治理的开放发展大局。首先,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有助于丰富相关国家的细节认知和全面认识,科学研判合作发展的形势和条件。比如,亚投行目前涉及 50 多个成员国,这些国家自然形态各异,文化国情不同,社情民意变动不居。不了解这些国家政治经济的“青萍之末”,就不能洞察其风云变幻,就会犯形势研判上的错误,造成外交上的被动。其次,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有利于更有针对性地开展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服务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民心相通战略。第三,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有利于掌握国际交往枢纽的发展动向,为全球治理和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贡献力量。那些战略要地、交往枢纽往往是文明、国家、市场多种力量的折冲之地,既由民族国家管辖,也分属不同的区域组织,民情国情不尽相同,需要做细致入微的研究。

科学研究方法是做好区域国别研究的关键。一是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所谓统筹兼顾,就是坚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立场,从全球治理和“一带一路”建设的要求出发,形成区域国别研究的顶层设计,按照国家利益的轻重缓急分类规划、分期推进,尽可能实现对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全覆盖。所谓突出重点,就是在开展普遍研究的同时,加强对重点国家、重点区域、重点内容的研究。二是因地制宜、角度多元。从根本上讲,由于不同区域、不同国家有着自然生成、自主发展、依托民族、文明演进等特点,因此,应融会贯通,从人类学、民族学、地理学、语言文学和历史社会学等角度,因地制宜地开展研究。同时,由于全球化与世界体系的发展,区域和国家有着同向发展、相似发展、相互依赖等特点,可以将语言文化研究、历史比较研究与政治社会研究等方法有机结合,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

郭树勇

目 录

丛书总序·····	1
序言·····	1

区域国别与国际关系

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思考·····	杨洁勉	3
实践·历史·文化		
——国际关系学习的思考与创新·····	秦亚青	14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	张宇燕	29
中国对外关系的时间位移和时间流变·····	胡礼忠	49
区域国别研究方法导论·····	郭树勇	71

区域国别案例研究

东亚区域国别研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黄仁伟	95
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性·····	张睿壮	108
俄罗斯与地区研究·····	冯绍雷	125
欧盟研究的几个问题·····	陈志敏	140
丝绸之路大文化背景下的中亚(学)建构		
——理论与方法探讨·····	汪 宁	152
日本的崛起、沉沦与徘徊·····	武心波	171
区域国别视角下的德国研究·····	戴启秀	217

区域国别与国际关系

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思考

杨洁勉

今天大概讲这么几个内容,第一,区域国别研究的任务。第二,国内外有什么理论。第三,中国特色的理论建设,理论相互借鉴、学习。最后,我讲几点我自己搞区域国别研究的心得体会。我希望,我个人的几十年的研究体会,大家能够理解。

那么第一个,区域国别研究。在英文里,没有 regional 或者 country studies 这个说法,英文里就讲 area studies。但是我们中国是讲区域国别。区域国别的研究同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是紧密相关的。近些年来,中国的中央政府领导部门加大了对智库的投入,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推进了中国特色智库的建设工作。我比较荣幸,是教育部区域国别研究专家委员会的成员,所以我对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有一些全局性的理解。中国教育部高度重视区域国别研究,有两个目标:一个是要世界第一流,第二个是要全覆盖。世界上有 200 多个国家和很多区域,大的可以被称为亚洲太平洋地区,小的可以被称为湄公河、大湄公河、东非、南方共同体等。现在正在做这个工作。全中国的大学有两三千,还有各类社会科学研究院所,所以这些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撑,中国人多地方大。关于国别研究,中国有一种说法,比如美国通、日本通。China Hand, Japan Hand,翻译成中文就叫中国通、日本通。因为英文和中文是有差别的。现在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为中国的总体外交服务。大家要知道,国别研究、区域研究是基础研究,但又是一个应用研究。大家要注意,国别研究、区域研究你要亲身参与。北京有一个地理区位优势,北大、清华。现在二流国家的元首、政要来访,北大的校长都不出来,国关学院的院长贾庆国老师出来就行了。那我在

聊城师范就不可能了。那么他有一个好处,现在科技发达了,你可以间接地或者虚拟地参与。你们看足球看奥运会为什么半夜起来?为了现场感。所以有很多事情你必须亲身参与。中国第一次召开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研讨会是在2012年3月22日到23日,在浙江师范大学,金华地区。浙师大的领导很有意识,想尽一切办法让大家到他们那里去,因为它的所在地不是浙江省省会,是个地级市,但是因为去了,它全校的师生就跟这个国别区域研究的 first-time 直接联系起来。我也有幸去了,从2012年到现在已经3年了,我基本上都参与的。同学们通过我,也间接参与了。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问题研究是很有特色的。郭院长来了以后把整个上外的区域国别研究又进行了整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建立了阿拉伯、丹麦、白俄罗斯、秘鲁、“一带一路”、希腊、奥地利、印度、波兰等研究中心。他们很努力,以前的校长向教育部申请,就把教育部区域国别研究教育的秘书处设立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那这样每次我们到那里开会,同学们就可以做志愿者,开会时就可以知道很多老师都是电视上或刊物上见到的,现在跟我们在一起,零距离。上海外国语大学,以中东和欧洲研究作为两大抓手,2012年成立了欧盟研究中心、英国研究中心、俄罗斯研究中心,消息传来,上外一片欢腾,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若有所失。当时他们认为这个不重要,没有去好好争取,结果他们就落选了。

下面我讲一讲我接触过的一些区域国别研究。比如说美国,有一位学者叫费正清。30多年以前,我去美国留学,就在波士顿地区。我从小就知道费正清,那个时候也没有恐怖主义,我就查电话号码簿,查到了就打电话到他家里,说“教授,我是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我想跟你预约见面”,老先生非常好,说你来吧。他跟我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很年轻,为什么呢?因为见了没多久他就去世了。人家告诉我,你很幸运,你打电话是他接的(一般是他太太接的),如果老太太接的话,就 no appointment。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是1955年建立的,他退休以后正式命名为“费正清研究中心”。这个时候他搞东亚问题研究,但是后来呢,这个中心就是中国研究中心。因为后来日本人出了钱建立了“赖肖尔中心”,韩国有钱了也把韩国研究拉出去,所以基本上就

只有中国研究了。这是东海岸,西海岸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ley)也有一位罗伯特·斯卡拉皮诺。他是1911年出生的,到2011年去世,1966年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首任会长,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的首任所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美国海军情报部门服役,学习日文,在中国有广泛影响。斯卡拉皮诺不知道来中国多少次了。我们学术界有句话:there are three Scalapinos,三个斯卡拉皮诺,一个在旅行,一个在写作,第三个在开会,非常努力。费正清是我没有进入区域国别研究前的榜样,斯卡拉皮诺是我在进入这一行以后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英国有个亚非学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为什么有呢?很简单,大英帝国在亚洲、非洲有许多殖民地,有利益之所在,所以它的这方面的研究是比较全面的。法律与社会科学,文科与人文学科,语言与文化学院等。再来看日本,日本北海道有个斯拉夫研究中心,1953年开始,1978年独立,到1990年成为国家级研究中心,现在有俄罗斯研究室、西伯利亚暨远东研究室、中亚研究室、比较研究室以及欧亚边界研究室。我讲了这么几个人,讲了美国、英国、日本等,就是说希望在座的各位要有一个 broad picture,你再去看看你这个单位、你所在的部门和你个人研究什么,因为你一定要找到值得追赶的榜样。

我们有国家主义、地区主义,还有全球主义。地区主义是相对于全球主义的一种国际现象,它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上掀起了第一波浪潮,就是我们所说的旧地区主义,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第二波浪潮,新地区主义,大概从冷战结束后延续到现在。跟以前相比,新地区主义更加开放,亚洲是新地区主义一个重要的增长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是1989年成立的,到1991年中国加入进去,加入得好辛苦,为什么?因为要三个地方一块儿进,一个是中国大陆,一个是台湾,还有一个是中国香港。中国香港问题不大,回归了就叫中国香港。APEC里面台湾怎么叫,因为APEC的工作语言是英文,它叫Chinese Taipei,他们坚持叫中华台北,我们叫中国台北。在美国或在日本开会都无所谓,因为只有一个Chinese,但到中国来就有问题了,因为要有中文标识。之后,中国、日本、韩国成立3+10,主要代表东亚地区。美国人就小心眼,就说那怎么可以中国做主导

呢,先把3个非东亚国家挤进来,一个是印度,它是南亚的,一个是澳大利亚,一个是新西兰,所以叫10+3+3。但他还嫌不够,最后自己也进来,还要加2,就是俄罗斯和美国。所以现在就变成了10+8,但名字还是叫东亚峰会。这个当然不是唯一的。比如77国集团,现在有100多个国家,但它的名字也不改。地区主义是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的中间形态,是当代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选项。地区主义的核心要义是超越国家层面,以地区的视角、思维、方式解决地区层面的公共问题。现在大家知道,国家还是基本单位,但是有的人就超越了,同时还可以叫跨地区。这个地区主义,我要讲两个人,一个是让·莫内,一个是舒曼。莫内是一个学者,舒曼是外交官,两个人倡议建立了欧洲共同体。法国和德国为了战略资源,即鲁尔地区的煤钢,打了一两百年的仗。莫内就提出来我们先组织一个煤钢联营,慢慢就变成了欧洲共同体。然后又成立了欧洲原子能共同体。这三个共同体加起来就叫欧洲经济共同体(EEC),这个EEC在1965年成立,成立的时候让英国参加,英国不参加。英国认为丘吉尔实行三环外交,即他和美国的特殊关系,同亚非拉殖民地的传统关系和与欧洲的邻近关系。后来怎么样呢?后来英国人花了10年时间苦苦哀求加入EEC,而且英国加入时人家的规则已经确立。德国是战败国,德国多出钱,法国是战胜国,是政治大国和农业大国。他们定的一个规则是工业大国多出钱补贴农业国家,而英国是工业国。所以现在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排除中国的逻辑,就是指他定了规则后我们就很难办了。后来EEC就变成了欧盟;1956年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埃及总统纳赛尔、印度总理尼赫鲁又搞了不结盟运动;1963年,非洲觉醒,非洲统一组织诞生,2002年成立非洲联盟。我这一辈子老是想超越国家,所以对地区组织、国际组织很感兴趣。而1989年APEC成立,中国1991年参加,也是人家先定的规则。国别研究有很多,我要和大家讲的是克里姆林宫学(Kremlinology),在冷战的时候西方特别是美国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研究,鉴于缺乏信息来源而依靠公开的报纸电影等有限资料进行细节、礼节、媒体等分析。分析苏联甚至中国,到现在还有,克里姆林宫学著名的黑白照片是乔治·凯南(1904—2005),他发布的八千字电报,后来发表,这个

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思想能管几十年。

我们的研究要捉到本质，捉到研究方向。任何的学习、任何的研究都有理论，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地区研究是周边研究，所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 2013 年 10 月底召开了第一次也是至今为止唯一一次地区研究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会上强调“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他还进一步指出，“这些理念，首先我们自己要身体力行，使之成为地区国家遵循和秉持的共同理念和行为准则”。如果我们研究亚洲地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有一个中国学研究所，由冯庆华副校长提出来，为一级学科。武心波老师任中国学研究所所长。其实中国学成立也没多长时间，我们要把中国学理论建设起来，道路还是很漫长的，理论界相互学习还是很重要的。我们上海外国语大学非常努力地争取了国别区域研究培训基地，2014 年的科学研究专题研讨会在我们这里召开，就是在图书馆边上的会议中心。

在国内，我们要相互借鉴，云南搞东南亚研究，例如老挝、越南，是很有特色的；兰州大学原来的副校长杨恕就是做新疆问题、俄罗斯、中亚研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原来的校长周烈老师是做阿拉伯问题研究的；东北黑龙江做俄罗斯研究；辽宁、吉林做朝鲜、韩国研究；上海专门做美国研究，所以每个地区我们都是可以借鉴学习的。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借鉴学习的有例如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在日本的东南亚问题研究领域有个福田赳夫首相在 70 年代提出福田主义，他的儿子福田康夫在 21 世纪初提出新福田主义。现在对付安倍，除了中国和韩国，其他国家都集体噤声了，这个福田主义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欧洲的中国学注重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当年那些人可追溯到马可波罗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在中国的政界，对中国的地区主义有很大研究的是王毅，他当过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主管亚洲司的副部长，现在是部长。中国的政治有一些是讲原则，讲思想，比如说合作共赢、包容发展。但是对现实的竞争对抗的理论还不够，而且体系也不够。任何理论是要接受实践检验的。除了战略理论，同时还要有政策理论，对于政府来讲，战略政策和原则理论都要好好学，对于跨界的理论要相互借鉴学习。

这一次我们庆祝联合国 70 周年在北京开会请来了坦桑尼亚总统，马哈蒂尔和基辛格，他们三个人贵为总统、总理、安全助理，坦桑尼亚总统提出农村社会理论；马哈蒂尔提出来的是东亚主义或者说东亚价值观；基辛格是权力制衡(balance of power)。所以游走于政学两界的人拥有丰富的治学理念，他们可以站在历史的角度总结过去。而理论和实践经验恰恰是做区域国别研究所需要的宝贵经验。在位的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的思想理论具有不断发展的特点，同他们的直接和间接交流是我们在地区和国别研究方面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的重要途径。你不一定能直接看到，但是实况转播很多，比如你想听习近平的讲话很容易。对于在位的，要看他思想怎么发展，对于不在位的，看他怎么总结，如果有可能的话，再去找将来可能在位的，这三种人找到之后，对你的国别研究、区域研究非常好。

我一直反对只讲“三个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自由主义，很多人以为这三个主义就能把天下的事情都解决了。三个主义自然要学，但更多的要学活的，像这些人、事、组织，就像我们进化学实验室，它是元素。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同学看新闻联播。

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是掌握大量一手的资料，建立广泛的人际网络，做到欧洲通、日本通等。1984 年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坐长途汽车，整整绕着美国走了一圈，然后我从纽约到旧金山横着又走了一遍，很难、很累，但使我对美国的方方面面有了很深刻的了解。我一直说，人生总有困难，总有机会，困难要来得早一点，机会要来得晚一点。因为你年轻，体力上可以，可以吃点苦。机会慢一点会不断激励自己，你要使自己成为美国通、缅甸通，你要算一算需要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和人生经历，但区域国别研究是需要研究理论的，就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指导与创新，如果你缺少这两点，那你就不是学者，而是记者，记者是要快，学者是要深。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协同创新和团队精神。现在国家提出了“2011 计划”，大家都搞协同创新，区域国别研究需要集体智慧和跨学科的合作，议政参政需要在尽可能广泛和专业有深度的范围内协同研究。今天我很高兴，我问了在座老师同学的构成，发现既有学国际关系的，也有学语言